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路与技术主题的凸现

王飞¹, 刘则渊²

(1.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6; 2.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 现象学是海德格尔步入哲学殿堂的敲门砖, 现象学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 可以说, 现象学在根本上规定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早期的海德格尔更是被当作现象学运动第二阶段的领军人物而倍受推崇。而后期技术又成为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全面地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角度考察技术思想的凸现, 有助于透彻地了解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及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海德格尔; 现象学; 技术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3 - 0044 - 04

早期的海德格尔是靠现象学谋生的, 并明显地依靠了他的老师——当时已赫赫有名的现象学大师、当代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的提携才捧牢了他的饭碗。他先是在胡塞尔思想光辉的照耀下获得了大学教师资格。(他的高校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理论》, 把中世纪思想加以蒸馏, “首先想在细节上发现其中现象学式的工作, 它们应是胡塞尔现象学工作的先驱。”^[1]) 进而在胡塞尔门下当助教并最终在胡塞尔的帮助下获得正教授的任教资格。1928年, 这位倍受胡塞尔赏识的年轻学者作为胡塞尔的继承人应聘于弗莱堡大学, 这使得他后来有机会成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 达到了他职务的巅峰。但事实依然明了的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在1927年就发现彼此在思想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并在30年代初公开决裂。“胡塞尔于30年代初表示与马克斯·舍勒和我两人公开决裂, 其态度之鲜明是不容置疑的。”^[2] 埃里希·米切姆在一份柏林大报上报道了此事。

海德格尔何以从一位胡塞尔的追随者发展成为胡塞尔的“敌对者”? 这恐怕要从海德格尔思想的源泉处说起。毕竟, 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 你如何开端, 你就将如何保持。”^[3] 虽然海德格尔与胡塞尔都是从布伦塔诺开始了他们的哲学之路, 但是两者的起点所依据的著作是不同的。胡塞尔所依据的是布伦塔诺的《从经验观点看的心理学》(1884), 而被海德格尔称为尝试去钻研哲学的拐杖则是布伦塔诺早

期的《论存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多重含义》(1862)。海德格尔微笑着说: “我的布伦塔诺是亚里士多德式的。”^[4] 布伦塔诺的这部著作扉页上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 δ

S即“存在者(就其存在来说)是以多重方式显现出来的”引起海德格尔的不安: “存在”问题侵扰着海德格尔的大脑, 并决定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如果存在者有多重含义, 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 什么叫作存在?”^[5]

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困惑, 使得海德格尔找到了《逻辑研究》, 把它作为现象学的入门之作。1909年海德格尔已开始阅读《逻辑研究》, 到1922年海德格尔仍在主持高年级学生的《逻辑研究》讨论。而此时, 胡塞尔已对《逻辑研究》失去了兴趣。海德格尔在此认识到担负着思的行为的现象学提供了一条可行性的道路, 即通向存在问题的道路。“通过现象学态度的昭示, 我被带上了存在问题的道路。”^[6]

当胡塞尔全力以赴用他的现象学方法来描述人类意识时,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却把“存在”作为他现象学的课题, 此时, 两人的分歧已不可避免。海德格尔在1927年的讲稿《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和大作《存在与时间》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一文中, 海德格尔将哲学规定为“存在的科学”, 认为我们应当宣告存在是哲学唯一正确的主题。他说: “这样对现象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就相当于提供基本的证据表明哲学是存在的科学和它如何得以成立的。”^[7]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 这部著作不

【收稿日期】 2002 - 07 - 28

【作者简介】 王飞 (1976 -), 女, 山东潍坊人,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
刘则渊 (1940 -), 男, 湖北恩施人,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仅使他获得了正教授的资格,而且使他名声大振,造成了一次深刻的轰动性事件。伽达默尔这样评论说,“出版于1927年的这本书,富有成效地与一战所带来的震撼性的、席卷了哲学界的新精神中的某种普遍的东西进行了交流。在当时吸引人们加以关注的共同主调是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第一批著作的同时代的读者一下子就被他的激烈的思想抓住了。……存在的严峻性促使他把死亡这个千古之谜视为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去质问存在的真正‘选择’。这就粉碎了教育和文化的幻想世界,扰乱了学院里秩序良好的宁静。”^[8]这就是说引起轰动的正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这一主题的关注。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方法的本质就是“面向事情本身”这个原则,而最根本的“事情本身”就是存在本身。海德格尔追问“现象学要‘让人来看’的东西是什么?必须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称为‘现象’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依其本质就必然是突出的展示活动的课题?”显然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首先于通常不显现,它隐藏不露,它构成显现着的的东西的意义与根据,即“存在者的存在”。^[9]正是这久已被人遗忘了的、无人问津的“存在”才是现象学作为专题收入其中的东西。“就课题而论,现象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10]当然海德格尔忘不了强调存在问题要求以现象学为方法。“无论什么东西成为存在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通过展示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1]这样存在论与现象学“这两个名称从对象与处理方式两个方面描述哲学本身。”^[12]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问题的研究要求以现象学为手段,而现象学原则自身又要求以存在问题为本源和指归,二者共生共容,共同构成哲学本身。

二

诚如上面所讲的,海德格尔赋予现象学在哲学中如此重要的位置。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发表以后直至1963年著《我进入现象学之路》的34年的时间里,海德格尔竟放弃使用“现象学”这一名称,“冷冻”了现象学。我们当如何理解这一实情?当然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马上注意到这一事实,而是仍然陶醉于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框架里滔滔不绝地讲着现象学。伽达默尔、勒维特、玻格勒等人虽然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亲得海德格尔的指点却仍未逃此“厄运”,海德格尔早期现象学思想的影响之深广由此可见一斑。直到60年代当美国人开始对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加以注意的时候,欧洲大陆的人们才开始慢慢醒悟过来,而这时海德格尔又重提“现象学”。这确实是一奇怪的现象,当别人大讲特讲他的现象学时海德格尔却避而不谈,而当大多数转向时,他又重提“现象学”。这其中海德格尔的良苦用心令人赞叹之余更值得我们深思。

海德格尔长期冷冻现象学这一名称,除了与他的老师、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的观点有严重分歧外,更为重要的是隐藏在他思想深层的一种“冲力的涌动”,即对现代人类命运的关注。尽管中外学者对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问题存在分歧,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如有的学者(理查森[西],孙周兴

[中])认为海德格尔的转变为“从此在到存在”和“从存在到此在”;有的学者(约瑟夫·科克尔曼斯[西],张祥龙[中])认为对存在意义的关注是海德格尔一生的主题;有的学者(冈特·绍伊博尔德[西],宋祖良[中])认为海德格尔在后期完全抛弃了前期的理论研究(存在)而转向对现实问题(技术)的探讨。但是大家似乎忽视了这样两句话:“我们必须理解实际性、真实性、生命力,生存论建构和持续为了我们能够在具体的实际、真实、有生命力、生存和持续的存在者中积极地生存。我们必须理解存在以此我们能够在世界中——我们必须在其中生存的并且我们作为此在能够存在的——敞开。”^[13]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和存在的意义的探讨都是源于对现代人命运的关注这一主题。在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中发生“转向”的是思维的对象(此在、存在、技术)而非思想主旨(拯救现代人类命运)。就像海德格尔谈到概念在场、让在场、解蔽给出和本有中是否有一种等级递进关系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概念并不构成一个等级关系,而是一条回归道路上的几个停靠站——这条回归道路通过暂先的东西而向本有开放。”^[14]作者认为拯救现代人的命运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旨,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命运源于对存在的遗忘,因此对存在的意义的追寻又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线。伽达默尔也有类似的观点。勒维特在回顾时说:“海德格尔的精神动力中的可感觉到的强度和看不透的深度使一切其它的东西都黯然失色,并使我们背弃胡塞尔对最终有效的哲学方法的幼稚的信仰。”^[15]当后期的海德格尔感到自己发现了现实悲剧之源(现代技术的本质)时,他毅然表明了他的治学态度:对纯学术的东西的冷落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心,海德格尔承认E·荣格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表明E·荣格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间人沦落为技术的奴隶的状况的揭示极为深刻,展示出西方的形而上学和数理科学如何通过尼采的“对力量的意愿”而表现于这个时代。要避免这赤裸裸的现代化技术力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险,就必须超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视野和语言,实现一个拓扑式的而非简单断裂的“转向”。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再只以知识带来的“光明”或“去蔽的真理”为实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黑暗”或“隐藏着的神秘”对于人的终极意义。在1930年做的演讲《论真理的本质》时就引用《老子》中“知其白,守其黑”一语;其德文表达是:“那知其光亮者,将自身隐藏于黑暗之中。”^[16]它的含义就是让现代技术“转向”或“转向到”人得以本真的生存态势。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始终是海德格尔关心的主题,当他发现现代人类命运的悲剧源于现代技术无往不在的统治时,他决然地把技术当作自己批判的靶子。同时为了引起世人对这一现象的共同关注,他“冷冻”了现象学。但是正如比梅尔所认为的那样,“后期海德格尔并不比前期海德格尔更少现象学的意味,只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已超过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象学。”^[17]事实上,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讲的,现象学绝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提供道路的方法,是一件有益于思的事情。“但从现象学的最本己的方面来说,现象学并不是一个学派,它是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于有待于思的东西的

召唤。^[18]而在 60、70 年代当他欣喜地看到有人开始注意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时,他又重提“现象学”这个名称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是他在后期首次提到现象学,在 1973 年他与法国朋友一起举行的最后的学术讨论会上,思想被规定为现象学——“不可显示物的现象学”。而在这期间和之后出版的一系列作品《现象学和神学》、《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等尽管多是前期所著,但仍显现出他对现象学的衷爱。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前期思想是对现象学的积极探讨(显性运作),而后期则是将现象学方法内化于思维方式之中用来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了(隐性运作)。现象学与存在论这个被海德格尔称作是描述哲学本身的名称恰如其孜孜以求的态势一样“大道式”地运作着。

三

“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存在作为技术的世界出现的时代。^[19]现代技术在现代已上升为社会的根本现象之一,它无所不在,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情无绪地统治着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原初样态。自然变成了单纯的能量提供者,人成了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可计算的棋子。在技术的统治下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人上升为主体,人与存在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自高自大的人类完全背弃了存在。“技术在其本质中实为一种付诸遗忘的存在真理之存在的历史的天命。^[20]源于对存在的意义的不懈地追寻,在现象学的哲学背景下,海德格尔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找到了存在被遗忘的根源——现代技术,海德格尔由此转向了对技术的淋漓尽致地考察。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的。^[21]技术转变为现代技术的过程,也是形而上学走向完成的过程。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当迈耶尔将技术的文化根源追溯到笛卡儿的主体论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时,海德格尔却回到了古希腊。他认为当柏拉图开始以“这是什么”的方式提问时,就已规定了西方思想的特性,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调。因为这种提问方式意味着“存在”被设定为存在者据以存在的根据(本体),而这种根据则成为被人所表象(把握)的某种对象性的东西。主客二分的主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此已发了芽,经过中世纪发展到笛卡尔,进入其确立阶段;到黑格尔则达到成熟(亦即终结)。这种主体形而上学就是存在的遗忘史,是遗忘的标志。伽达默尔说:“通向形而上学的那一步是在一条道路上的第一步,在这条道路上,西方的历史把自己推向当前的尖锐化。海德格尔把西方历史的尖锐化描写成存在遗忘和存在遗弃。^[22]主体形而上学以表象性的思维把握世界,世界就成为图像了,一切在它眼中都成为可供计算,可供利用的对象;人成为存在者关系的中心,他为一切存在者制定尺度和准绳,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的暴力。这样形而上学就预先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之本质。“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这回事情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23]这样,海德格尔就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现代技术的起源,并把技术置于哲学

最重要的位置(本体论位置),从而完成了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以实践取向取代了理论取向)。

这样,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本质的规定——“座架”也就是势所必然了。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原本是一种解蔽方式,是存在之揭示或真理的发生领域。古代的技术便是这一本质的展现(海德格尔以风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现代,随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和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技术才改变了其性质,成为一种促逼。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阳光、空气、大地、河流都为技术之本质而存在,被订造而到场;这种促逼也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在根本上,人也成了技术体系之一微不足道的要素。事实上,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虽然把人本身定为主体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同时导致了技术的膨胀;但技术的恶性膨胀却反过来引起了人的主体地位的沦丧,人成为单纯的持存物。技术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它的发展完全不依靠人的意志,人变成了技术的奴隶。在这种状况下,人无限地实施对自然的订造,疯狂地破坏自然;人与自然的对立、地球的毁灭成了技术发展的未来命运,人的根基持存性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而且连根拔起。^[24]

但是我们不可盲目地推动技术或者无助地反抗技术,把技术当作恶魔来诅咒,这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同一回事。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其支配作用归于命运,乃存在之天命的一种遣送。此命运锁闭了其它一切可能性,而使人走向一种可能性的边缘,因此也就孕育一种危险,而且是最高危险。“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25]因为技术之本质在一最高意义上是两义的。“一方面,座架促逼入那种订造的疯狂中,此种订造伪装每一种对解蔽之居有事件(Ereignis)的洞识,并因而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另一方面,座架自行发生于允诺者中,此允诺者让人持存于其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Wahrnis)——这一点迄今尚未经验,但也许将来可得更多的经验。如此,便显现出救渡之升起。^[26]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两义性的规定使得他的思想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显得与众不同。他既不像技术悲观主义者那样把技术作为妖魔,也不似技术乐观主义者那样认为技术是带来无限光明的力量,而是在肯定了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时,从技术之本质自身(存在的天命)中发掘了救渡之可能性(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解救之路的探寻因此而不像 F. G. 荣格与埃吕尔那样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人归本于真理之居有事件,守护着真理之本质,使万物得以如其所是的显现自身,因而技术也得以回归其原初本质——一种解蔽方式,真理之发生领域。张祥龙对此体悟颇深:“技术造成的历史命运不会‘不要技术’的意向和做法所改变;改变只能来自追溯这技术的技艺和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以求在回复之中脱开形而上学加给的那些特性,而返回到人的缘构生存之中去。^[27]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之拯救并非主要通过人而发生,但也远非无需人就可以发生的真理之居有事件(Ereignis)从根本上规定着人的归本与技术的归本,二者在

通向真理之居有事件(Ereignis)的途中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相互促进、共生共容的,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人类在行进的途中,只有明了这一点,才能自觉地倾听大道(Ereignis)^[28]之音说,对物以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的态度期待技术的解救和人的命运的转换(技术和人的归本)。“作为如此这般被需要的东西,人被归本(Vereignen)于真理之居有事件。这样或那样遣送到解蔽之中的允诺者,本身乃是救渡。”^[29]

【参 考 文 献】

- [1]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0.
- [2][3][5][6][14][18][20][21][23][24][25][26][2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1296、1011、1280、1286、712、1288、384、884、430、1305、946、951、950.
- [4][27]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三联书店,1996.45、432.
- [7][13]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M], Publish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8]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选集[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460.
- [9][10][11][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0.42、44、42、45.
- [15]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2.
- [16]张祥龙.海德格尔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236.
- [17]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四辑)[C].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08.
- [19]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7.
- [22]伽达默尔.海德格尔与希腊人[A].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第二卷)[M].法兰克福,1991.67.
- [28]对“Ereignis”的译法不仅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译法,同一译者在不同的篇章亦有不同的译法,“居有事件”、“本有”、“大道”、“自身缘构发生”都是“Ereignis”的译文.

(责任编辑 成素梅)

(上接第 39 页)

它不是让我们不去追求科学理论的可靠性,而是让我们在相信没有绝对的根据去相信科学理论解释检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科学理论的内在特征、外在特征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去检验、评价理论,确立科学理论的真实性,追求更大的可靠性。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到科学理论检验的有限性只是表明理论检验的相对性、复杂性、多样性,并不表明科学理论可以不通过这样的检验过程去进行,更不表明科学理论所涉及的所有的定律和对象都是不可完全检验的。对于有些理论可以被完全检验。如果理论不是全称性的规律,而是特称规律,那么该理论是可以完全证实的。例如,“存在一些乌鸦是黑的”。我们只要经过若干次观察就能证实这一“存在陈述”为真。还有就是如果理论只涉及有限的或可数的对象,那么该理论也是可以证实的。例如,“夸克都带有分数电荷”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完全检验。因为通过物理学,我们知

道只有六种夸克。对于上述命题,只要分别检查每一种夸克所带的电荷就可得到确证或证伪。

【参 考 文 献】

- [1][2] Peter Kosso. (1992) Reading the Book of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2. 44、154.
- [3] Barnes, B. (1985) T. S. Kuhn, in Q. Skinner (ed.) The Return of the Grou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6.
- [4] Barnes, B. (1981) On the 'Hows' and 'Whys' of Cultural Chang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93.
- [5] A. Franklin, The Epistemology of Experiment, in the Use of Experiment, 1989. 441.

(责任编辑 殷杰)